第一章　互悖互逆的“离散”与“聚合”

——抗战以前中华民族“离散”、“聚合”的追溯与透视

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同时揭开了日本侵华和中华民族抗日战争的序幕。由此，处于生死存亡危急关头的中华民族，愤然祭起正义的自卫之剑，与凶恶的强盗进行殊死的决战。经过长达14年之久的浴血奋战，中华民族终于以自己的血肉之躯，托起了抗战胜利的不朽丰碑。今天，在这座巍峨的丰碑历经50个春秋之后，当我们回顾中华民族在那场反侵略战争中展示的凛凛正气，当我们进一步追究日本侵略者胆敢在神州大地玩火的原因，都可以清楚地发现：那与中华民族内部的离散力、凝聚力，以及二力的盛衰消长，都存在着绝非等闲的关系。

第一节　发人深省的“离散”与“聚合”

一、聚、散二力的性质

当“九·一八”事变、卢沟桥事变相继发生之后，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日本侵略者曾经是那样的得意忘形，那样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的弹冠相庆，仿佛他们的对手只不过是任人宰割的羔羊，仿佛中华大地只是唾手可得的肥肉，因此把“速决战”、“速胜论”喊得震天价响。然而曾几何时，他们惊恐地发现：对中华民族而言，反侵略战争简直是一种神奇的凝聚剂。当中国共产党锻造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个理论法宝的时候，当兵戎相见的国共两党为着共同的抗日目标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时候，当长城内外、大江南北的中华各族儿女分头并起、矢志抗日的时候，当中国军人视死如归、喋血沙场的时候，当海外华侨踊跃输将、舍身救国的时候，不可一世的侵略者终于感到：他们激怒了中华民族这个昏睡百年的巨人；他们所进行的是一场绝无胜利可言的不义之战；他们落败的主因之一正是中华民族焕发出了巨大、坚韧而又无法战胜的凝聚力。由此我们不能不感叹，凝聚力之于中华民族是何等的重要。

然而，当我们品尝建立在民族凝聚基础上的抗战胜利成果的时候，我们一刻也不能忘记，日本侵略者毕竟使我们民族蒙受了长达 14 年之久的巨大战争灾难，毕竟使我们民族在血雨腥风的浩劫中付出了 2100 万生命和难以数计财产的沉痛代价。如果我们本着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的态度进一步反思这场战争的起因和日本侵略者为何选择中国为侵略对象的话，固然要对帝国主义的扩张本质加倍警惕，但同时也要明了：当年中华民族那种昏睡不醒、涣散不聚的状态，正是授敌以可乘之机。由此我们又不能不感慨，离散力之于一个民族是何等的危险。

时至今日，当我们对中华民族当年的成败得失感慨系之

的时候，我们决不能只在感性的王国长吁短叹或兴奋激动，而必须由感性向理性飞跃，对当年中华民族的“离散”和“聚合”二力进行理性的追溯与透视。只有这样，我们的民族才能保持清醒的头脑，不断地增强凝聚力，不断地克服离散力。这对于我们的民族避免重尝被侵略的苦果和面向未来、再造辉煌，都是重要和必要的。

如果我们要从理性的层面认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离散力的话，那么迎面而来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对之加以理论的界定。根据近年来的研究成果，我们完全有理由说：“中华民族凝聚力是中华民族赖以统一、独立和生存、发展的内在动力”。它又包括三个有机的组成部分，即“民族整体对民族成员（或称民族个体）的吸引力，民族成员对民族整体的向心力，民族成员之间的亲和力”。① 不言而喻，中华民族的这种凝聚力不仅古已有之，而且在抗日战争的特定历史时期，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更为丰富和生动的内涵。这是因为，从来也没有出现过超越阶级、阶层、党派、团体、宗教、信仰、种族、宗族、家族等界限，全民族为着共同的抗日目标而自觉地凝聚一体的盛大局面。

虽然中华民族内部存在的离散力的问题，时下仍未引起理论工作者的足够重视，以致还拿不出对这种离散力界定的陈说，但前面对中华民族凝聚力的界定，还是给我们提供了有益的启示。这是因为，聚、散二力既如影随身地同时存在，

①孔庆榕等编：《中华民族凝聚力论纲》，第 11 页，1995 年广东人民出版社版。

又互为矛盾地尖锐对立，所以，根据二者的对立统一关系，完全可以作这样的反证：中华民族内部的离散力，是中华民族统一、独立和生存、发展的阻力。进而还可以判定，这种离散力对前述凝聚力所包括的“吸引力”、“向心力”、“亲和力”来说，都是方向相反的制约力量。显而易见，中华民族内部的这种离散力从近代伊始便不乏见，而且在抗日战争期间也屡有表现。以溥仪为首的伪满洲国、以汪精卫为头子的汪伪政权以及其他大小傀儡政权和汉奸的次第出现，在很大程度上正是背叛民族的离散力使然。

当然，上述对聚、散二力的定性仍是概括的，远未到条分缕析的地步，详细讨论二者的性质也不是我们的任务。我们所以要首先对二者作基本的性质界定，是因为要提请人们注意，“九·一八”事变前后，特别是“九·一八”事变前，中华民族内部确曾并存着性质绝然相反的两种力量，并且聚、散二力的矛盾冲突，客观上大大消耗着民族本应具有的巨大力量。否则，蕞尔弹丸的日本小国，决不敢对偌大的中国轻试锋芒；即使日本利令智昏，它也决不可能兵刃所向，连连得手。

在粗略界说聚、散二力的性质之后，还需要清楚地看到，二者都不是可以直观的、一望可知的简单图像，而是内涵既丰富又复杂的系统。如果将中华民族凝聚力视为一座宏观的大厦的话，那么，大厦之中则包含着各楼层的层面以及各单元的房间，甚至还可以细分为房间的各种设施等。具体地说，诸如中华民族内部的各阶级、阶层、党派、宗教、宗族、家

族以及文人学士中的学社诗社、下层社会的行帮结社等的凝聚力，都是构建全民族凝聚大厦的砖石。当然，这种砖石并不都能天然而有机地组合在一起，它们需要一定的凝聚剂来互为结合。抗战时期最有效的这种凝聚剂不是别的，正是中国共产党积极创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反之亦然。如果将中华民族内部的离散力比作一座土丘的话，那么它也是由品质不尽相同的泥石堆叠而成的。

聚、散二力的系统性实际上向我们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是一个宏大的系统工程，需要入细入微地致力于包括阶级、阶层、党派、宗教乃至于家庭等各个层面、各个微观粒子的自身凝聚。如此，方能使中华民族凝聚力大厦的各层面、各部分处于正常状态，方能使整个大厦获得可靠的抗震能力，在外敌入侵面前保持稳固不摇之势。令人遗憾的是，“九·一八”事变前的国民政府，非但没有巨细兼及地注重凝聚民族的工作，反而视共产党为仇敌、视民众如猛兽，其内部又党争激烈，派系分明。因此在国民政府统治下，中华民族远未紧密地凝聚起来。

同样，消弥和克服中华民族内部存在的离散力，也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我们的民族从大处着眼、从社会的各个领域入手，点、线、面、层多管齐下地进行综合整治，才能逐步地清除垒成离散力土丘的污泥顽石，从而从总量上使离散力降至最低水平。而所有这些，也正是中华民族为迎击外来侵略和赢得反侵略民族战争胜利的重要保证。应该看到，在抗战时期，特别在卢沟桥事变以后的八年全面抗战时期，我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们中华民族在克服离散力方面的工作是卓有成效的。为了全民族的根本利益，国共两党第二次握手；一批本系反动的社团汇入抗战潮流；不少少数民族的王公贵族缓解了与下层群众的矛盾并一道共同抗日；全国出现地不分东西南北、人不分男女老幼的抗战热潮；包括海外华侨在内全中华民族中出现的各种义勇军、惩奸团，等等，无不显示人们已极大地凝聚起来了，从而也使伪满洲国、汪伪政权等离散势力处于极度的孤立地位。

必须指出，聚、散二力不仅仅是互相对垒的两大系统，而且各自还是无时无刻不在发展变化着的动态系统。如果考察由聚、散二系统构成的更大范畴的矛盾统一体的话，那么也不难发现，这个统一体同样是一个动态系统。这个动态系统的“动”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凝聚力系统的内在变化，二是离散力系统的内在变化，三是聚、散两系统之间的互为渗透、互为异化。

在凝聚力系统内部，各层面、各分支、各单元的内聚力，应该是彼此相通、互为支撑的，由此共同烘托出凝聚力的大厦，并且不断地为大厦固基、添砖、加瓦，使之增力度，上层次，上档次。然而，那些为全民族提供凝聚力的阶级、阶层、党派、宗教、宗族、家族乃至于个人，又不可能或者说不可能都天然地将全民族的整体利益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完全可能自觉不自觉地产生个体、局部利益与全民族整体利益不相适应甚至相违相悖的情况，即使在置全民族利益于至高无上地位的中国共产党内部，也不可能完全杜绝离散因素

或思想的影响。例如，党内的那些变节投敌分子，那种以“左”的面貌出现叫嚷对国民党“只要斗争，不要联合”的论调，其实对中华民族的凝聚都是有害无益的。因此，在凝聚力系统内部，其力度便不可能处于静止不变的状态，有可能向衰减或增强两个不同的方向运动变化。当中华民族内部的某一局部，致力于消弥本局部的涣散性，并将本局部的利益置于服从民族全局利益的位置时，那么，它将起到增强民族凝聚力的促进作用；反之，它将产生衰减民族凝聚力的负面影响。所以，一个进取向上、大有作为的民族，决不能悠然自得地满足于历史积淀下来的凝聚力，在外敌破门入侵之时尤其是如此；而应该居安思危、临危急起地修整和巩固凝聚力大厦，使侵略者在民族凝聚的铜墙铁壁面前碰得头破血流。抗日战争的历史事实证明，我们中华民族正是这样一个进取向上、大有作为的民族。

在与凝聚力系统势同水火的离散力系统内，同样并非是一成不变的。堆叠成离散力土丘的那些泥石，总是有条件地互为支撑、互为依靠的，一旦条件发生变化，它们也有可能向正、反两个方面发生变化。一方面，在民族凝聚力衰减的情况下，它们有可能更加板结地结合在一起，从而使原有的离散力进一步增大，甚至有可能吸纳和消化新来的泥石，使离散力的土丘渐次膨胀。另一方面，在民族凝聚力增强和离散力系统内部矛盾加剧的条件下，它们有可能松解原有的相互联系，甚至从土丘中分离出来，并投向凝聚力的系统，从而使原有的离散力趋于衰减，并为增强凝聚力提供条件。抗

战时期的国民党将领马占山，可以说是在离散土丘中游离分化出来的典型。“九·一八”事变后，他违背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率先在东北奋起抗日；可是不久又与日本侵略者妥协，参加了伪政权；当全国人民凝聚抗敌的热潮迅速高涨之时，又有感于民族大义，从而猛醒思过，并秘密组织旧部，重举抗日大旗，投向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离散力系统可能产生的这种双向动态性也清楚地告诉我们：民族内部存在的离散力并不是一座不可融化的冰山，一个有作为的民族决不会面对内部的离散力而束手无策或徒唤奈何，而会能动地分化瓦解离散的土丘，化其泥石而为增强凝聚力的材料。抗战时期马占山转变的事实证明，我们中华民族正是善于做转化工作的高手。

当然，并不是所有离散势力都转化得了的。例如抗战中那些铁心背叛民族利益的离散势力或分子，还必须对之作不调和的斗争，以便尽可能地清除或遏制他们的影响。一个理性的民族，在通过转化工作以消弥离散力的同时，应对那些冥顽不化或贻大害于民族的离散势力或分子，采取秋风扫落叶般的断然措施。事实正是如此，中华民族在对待溥仪、汪精卫之流民族败类时，从未表现出不合时宜的心慈手软。这就证明：我们中华民族在对待内部存在的离散力方面，保持着高度的理性，既不乏做转化工作的高超艺术，又具有攻坚打顽的气势和魄力。

在了解了聚、散二力各自系统内在的变化后，便不难理解两系统之间互为渗透、互为异化的第三种动态变化。简单

地说，聚、散两系统内部的成分，都不是纯之又纯的，都程度不等地夹杂着与本位系统相对抗的杂质，也可能分泌出新的否定本位系统的新杂质，而所有这些杂质又都是对方系统的水分和养料。因此，创造条件促使凝聚系统加速同化反应与促使离散系统加速异化反应，对于增强民族凝聚力以成就民族的事业而言，都是不容忽视的。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华民族，虽一度承受着民族离散的巨大压力，但终于成功地进行了凝聚系统的同化反应和离散系统的异化反应，从而闯出了逆境，获得了空前未有、同仇敌忾的强大凝聚力，赢得了抗战胜利的辉煌成果。

不言而喻，仅仅看到聚、散二力的是非性、系统性以及动态性，还只是属于察其表、观其流的认识，离究其里、探其源还有一段相当的距离，而“究里探源”又是从根本上增强民族凝聚力克服民族内部离散力的重要环节。为此，我们有必要同时追踪聚、散二力产生的根源。

二、聚、散二力的根源

根据对立统一的原理可以判定，一个民族当它具有内在凝聚力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内在的离散力；根据唯物主义的观点，我们还可以进一步断言，聚、散二力作为一对势同水火的孪生天敌，都不可能是无源之水或无本之木，而且只能是产生于同一的母体。这个母体不是别的，乃是无所不包的社会和自然的客观存在。

客观存在是一个只可渐知、难以穷尽、复杂得令人目眩的大千世界。作为已有数千年发展历史的中华民族，其聚、散

二力从根本上说，取决于社会的客观存在，它包括了诸如政治、经济、文化、军事、民风、民俗等许多方面的因素，其中主要是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这三大因素。

时下，理论工作者在讨论中华民族内部离散力的成因时已经提出了这样的观点：“从根本上说，民族离散力主要是通过糅合政治、经济、文化三者中的消极因素而形成的合力”。① 据此，我们完全有理由反证：中华民族的凝聚力从根本上说，是通过汲取政治、经济、文化三方面积极因素而汇成的另一种合力，它与离散力同母而异质，同源而异流。概而言之，正因为中华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领域不可避免地同时存在着积极和消极两种因素，所以在这些土壤上既能生长民族凝聚力的大树，又会滋生出导致民族离散的野草，尽管在大多数情况下野草远不可和大树争雄。但也应看到，在若干特定的条件下，由于野草恶性蔓延，也会使大树因营养不良而渐行枯萎。

在政治领域，有助于民族凝聚力之苗长成参天大树的积极因素是显而易见的。在中国，统一的多民族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封建国家形成已久。虽然它只是一种较为落后的属于中世纪的社会国家形态，但政治的一统是对以往小国寡民、列国纷争离散格局的有力否定，由此也带来了各民族在统一的国家中互为融和凝聚的盛大局面，并产生着深远的影响。秦汉以来，国家的统一、民族的融合所以成为不可逆转的潮流，

①《中华民族凝聚力论纲》，第 311 。

显然是和政治的一统密不可分的。值得注意的是，政治又是经济、文化的集中表现，有时具有辐射经济、文化乃至其他社会生活的超强穿透力量。很难设想不通过秦始皇的政令，天下会迅速出现“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的现象，而这些顺应民族之需要的“同”通之处，在很大程度上都属于维系和强化民族凝聚的纽带。当然，除顺应民心的政治统一外，若干利国利民的政策，都不失为滋养民族凝聚力大树的养料。古代唐朝对土蕃施行的联姻和亲政策,近代孙中山的‘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的主张，[①] 都曾经发挥了促进民族凝聚力增长的积极作用。然而，在“九·一八”事变以前，自称是孙中山事业继承者的蒋介石，却不能在前人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和实施有利于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的政治主张。

毫无疑义，滋生离散力的政治因素也不鲜见，在剥削阶级对中华各族人民进行统治的历史时期尤其是如此。这是因为占人口极少数的剥削者，由于受到时代和阶级的局限，不可能以全民族的利益作为施政的最高准则，往往为本阶级或小集团的利益而损害全民族的利益，因而不可能不与被剥削者发生时而缓和时而激烈的矛盾。当少数剥削者在政治上推行误国病民的政策时，势必要导致民族离散力的膨胀。

翻开中国历史，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一些执掌中央大权的汉族贵族，为了转移汉族人民的视线，也为了分而治之

①《孙中山全集》第 2 卷，第 2 页，1982 年中华书局版。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地压迫各少数民族，曾不止一次地玩弄“夷夏之辨”的把戏。这种政策的要害，在于蓄意离间汉族人民和其他少数民族人民的关系，使之不易凝聚一体，形成合力，去震慑宰治于他们之上的统治者。值得一提的是，这种政策经过朝代的转换，也常常被执掌中央大权的少数民族贵族所利用。例如，清朝的满族贵族就曾将“夷夏之辨”演化为“重满抑汉”的政策，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汉、满失和的不良结果。不过，从总体上看，由于汉族贵族执掌中央大权的时间较长，所以“夷夏之辨”的政策为害也更多更大。正因为此，毛泽东才这样说：“历史上的反动统治者，主要是汉族的反动统治者，曾经在我们各民族中间制造种种隔阂，欺负少数民族。这种情况所造成的影响，就在劳动人民中间也不容易很快消除。”① 由此可见，消极的政治因素对民族离散力的滋生，是有严重影响的。

必须指出的是，在“九·一八”事变以前，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为了维护其统治，非但未能致力于消弥汉族和少数民族之间尚存在的隔阂，反而把“分而治之”的手段发挥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对汉族甚至对其统治集团内部也是如此。例如，在国民党外部，他力主“分共”；在其内部，又有亲信非亲信之分，嫡系非嫡系之别。如此，使中华民族无从在同一的正确的政治前提下实现民族的大凝聚。

作为政治的基础，经济领域内的消极和积极因素，对于

①《毛泽东选集》第 5 卷，第 278 页。

制导民族内部的离散力或凝聚力，无疑具有最为根本的决定作用。这是因为“社会关系和生产力密切相联”，[①] 而由生产力所决定的生产关系，又“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②] 纵观中华民族生产力发展的长河，我们可以清楚地发现：民族凝聚力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增强的；民族内部的离散力则却是随着生产力的衰减而增强的。当我们中华民族的祖先开始进行物质生产劳动，并开始生产“他们所必需的生活资料”时，[③] 他们就不仅完成了从古猿到人类的进化过程，而且在原始社会创造出了人类最初的凝聚结构，这就是原始群。此后，随着生产力的渐次发展，中国社会渐次由原始社会过渡到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由此也相应出现了规模渐宏、层次渐高的民族凝聚现象，据此，我们完全可以断言，推动生产力发展的经济因素，也就是促进民族凝聚力增强的积极因素。当然，我们不是唯生产力论者，我们所指的生产力是民族经济的生产力。那种助成殖民经济或买办经济发展的因素，不在促进民族凝聚力增强的积极因素之列。

然而，在中华民族凝聚力基于社会经济演进规律而不断发展的过程中，滋生离散力的经济因素也时有表现。这种因素有的是受历史条件限制而自然存在的，有的则是因人们的倒行逆施而产生的。譬如，当自然经济作为一种主要经济形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第 82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卷，第 108 页。
③ 同①书，第 52 页。

态在近代中华民族的经济生活中仍汪洋大海般地存在时，它便成为一种自然地产生离散力的温床，尽管它比前此的原始猎猪经济以及井田制的奴隶社会经济有较大的凝聚人群的功能。这是因为，自然经济是以个体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紧密结合为基本特征的。在这种经济体制下，产品主要是用于生产者自身或缴交给地主，而非用于流通交换。所以，一家一户的基本生产单位，难以通过经济活动结成紧密的凝聚关系，各自基本处于“一盘散沙”状态。更重要的是，它又是以占人口总数极少部分的地主、贵族占有绝大多数生产资料，并且不劳而获地榨取农民劳动果实为基础的，这就势不可免地要使社会分裂为地主和农民两大对立集团。所以，不管自然经济的存在曾经有过多大的进步性和合理性，它始终都不能适应各民族成员在平等基础上实现大凝聚的要求，始终都保有滋生离散力的消极因素。值得强调的是，在“九·一八”事变前夕，中华民族内部虽然已出现了否定自然经济的近代化工商经济，但自然经济在全部经济生活中，仍顽固地、大量地存在，使近代化的民族工商经济只能是自然经济大海之中的零星小岛。可见，如何使广大民众从自然经济的小天地走出来，并且汇聚到大工业生产的洪流中去，进而通过经济纽带结成共御强敌的万里长城，乃是一个艰巨的任务。

至于那些本非不可避免、完全人为制造出来的消极经济因素，也不是什么罕见的东西。历代反动统治者那种对各族人民的超经济剥削，对新生产力的扼杀，以及抗日战争前出现的新老军阀漠视民力、拥兵自重、割据纷争等等，都不同

程度地破坏了正常的经济秩序，使各族人民更难通过经济联系来强化相互的凝聚力，从而也为离散力的潜滋暗长或迅速泛滥提供了条件。因此，保护和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与抑制人为的对生产力的破坏，对于克服离散力来说，同样显得十分必要，也是中华民族在抗日战争时期须臾不可忽视的重要任务。

在文化方面，互为矛盾的两重性同样是显而易见的。我们不妨以传统的儒家文化为个案，以期举一反三，窥斑见豹。

应该说，儒家文化是饱含着精华的，由于它的长期积淀，也确曾给中华民族的凝聚积累了厚重的文化基础。例如，儒家奉为不易信条的“中庸和平”，对于协调人际关系，就不失为一剂灵丹妙药，这也是它广为人们接受并相沿不绝的重要原因。“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可以说是儒家的警句，这种以己度人、将心比心的要求，充满了浓郁的东方人情味，让人倍感人际关系的和谐，也易于引导人们在相互理解的平等基础上进行交往。可以说，它也是有利于人们凝聚团结的胶粘剂。实际上，它也在相当程度上化成了人们自觉遵守的行为准则。至于人们崇尚的“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无一不利于协调人际关系，也都可以从儒家文化中找到它们的来源。事实上，如果我们要穷究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要理解不同阶级、阶层、党派、团体的人们为何能“和而不同”地携手抗日的话，都可以从诸如儒家经典等传统文化中找到答案。

当然，儒家文化决非是净土一片，也存在着妨碍人们凝

聚的糟粕。儒家的鼻主孔子就曾说过“生而知之者,上也”,① “唯上智与下愚不移。② 在他看来，社会成员是分为“上智”和“下愚”两大部分的，前者制约后者，后者受制于前者。如此，双方就没有多少平等可言，也无从在平等的基础上结成和谐的凝聚关系。这也表明，儒家等传统文化既有为民族的凝聚力提供养料的一面，也有为民族离散力提供水分的一面。因此，如何对传统文化扬其精华，去其糟粕，也就成了文化战线积极抗日的主要内容。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在八年全面抗战期间，正是因为广大文化界志士仁人的不懈努力，才进一步强化了中华民族“和而不同”“求同存异”的观念,使之在《义勇军进行曲》、《黄河大合唱》等文化精品的激励下，万众一心地与日本侵略者作殊死的斗争。

三、聚、散二力的走势

在大体说明了聚、散二力的性质和根源之后，迎面而来的便是聚、散二力的走势问题，亦即聚、散二力消长的基本动向和一般规律的问题。为此，我们有必要就此问题作约略的探讨,以便勾勒出“九·一八”事变前中华民族内部聚、散二力两刃相割的概貌。

有人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华民族的凝聚力是伴随着离散力的逐渐衰减而与时俱增的。初一看来，这种见解不无见地，在大多数情况下，确实是越到后来民族的融合就越充分，所显示的凝聚力也越强劲。但是细一捉摸即可发现，我

①《论语·季氏》。
②《论语·阳货》。

们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并不全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直线上升的,有时会产生曲折甚至是倒退。在统一的国家建立之后，中华民族在历史上仍经历了大约 1/3 的分裂时期，就是毋庸讳言的明证。所以“直线上升”说并不可靠。

也有人认为，中华民族的聚、散二力呈“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之势。这种观点是看不到几千年来中华民族凝聚力呈现的螺旋式上升的基本态势，而且把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社会形态中所显示出来的聚、散二力，不加区别的混为一谈或等量齐观，显然是不对的。

如何认识中华民族的聚、散二力消长的规律性呢？

一、纵观中华民族的发展史，在渐次上升的各个社会形态中，如果国家统一，政治清明，经济、文化生活正常，那么，在这样的时期民族的凝聚力则强，离散力相应较弱；并且，越往后，社会越处于高级的形态，民族的凝聚力就越比前此较为低级的社会形态的凝聚力要强。这是一条最为基本的规律，它的“逆定理”也是存在的。然而抗日战争前夕，中华民族的国家实际上并没有完全统一，这不仅仅表现在国民党政府形式统一的外壳内包含有多种各自为政的社会力量，还表现在像台湾这样偌大的省区实际也是国民党政府鞭长莫及之地。至于在经济、文化领域的生活，也远未与“正常”二字结缘，横征暴敛者有之，巧取豪夺者有之，文网密布者有之，动辄得咎者有之。所以，抗战前夕不可能是民族凝聚力较强的时期。

二、在同一社会形态甚至同一朝代中，聚、散二力始终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